

Apr. 14
2025

全球治理学科动态
2025 年第 2 期（总第 38 期）

全球治理中的 小多边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IWEP）

本期执笔

张尊月 和怡然 刘哲希
郑 路



专题序言

拓展小多边和次区域合作是推进和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增长点。本期《全球治理学科动态》以“全球治理中的小多边主义”为主题，探讨了小多边主义的兴起原因、表现形式及其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的有效性与局限性，分析了小多边安排在制度合法性、代表性及公平性方面的挑战，深化了对小多边主义作用机制和实际效果的认识，为理解全球治理转型趋势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提供了有益启示。同时需警惕以“小多边”之名搞地缘政治的小圈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应坚持开放包容、厉行法治、协商合作、与时俱进的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本期目录

1. Jagannath Panda and Jae Jeok Park, “Minilateralism and Glob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Hybrid Model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8, No. 6, 2024.
2. Xian Wu and Dongchan Kim, “China’s Perception of Minilateralism and Chinese-style Multilateralism,”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8, No. 6, 2024.
3. Megan Dee, “Minilateralism and 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 in the Global Nuclear Order,”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45, No. 3, 2024.
4. Nick Bisley, “The Quad, AUKUS and Australian Security Minilateralism: China’s Rise and New Approaches to Security Cooper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Forthcoming.

本期审校

陈兆源、杨嘉豪



No. 1**Jagannath Panda and Jae Jeok Park***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78, No. 6, 2024.****“Minilateralism and Global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Hybrid Models”****《小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混合模式的有效性》**

近些年的多重冲突使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表现出混乱的迹象。一触即发的危险与长期持续的冲突叠加，更加突显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的失信，以及全球治理的失效。与此同时，亚太地区呈现小多边主义制度增长的趋势。这种基于“情境利益、共同价值观和相关能力”的小多边被认为是对全球治理危机的一种回应。那么，小多边主义究竟是振兴“昏迷”的多边主义的解药，抑或仅是区域碎片化的产物？其又如何强化国际治理架构？对此，作者认为，小多边主义有助于恢复混乱的多极秩序，并重新增强全球治理。

相比于奠定全球治理秩序基础的多边主义，小多边主义是一种更“狭窄”，也更灵活的制度框架。小多边主义具有一些独特和明确的识别特征，比如临时性、非正式和自愿、分散、跨政府，以及涉及多层次和多利益攸关方，而非纯粹以国家为中心。文章通过对印太地区的分析指出，大国博弈的激化以及区域的分裂加剧了该地区的小多边主义。小多边制度为区域其他国家提供了一种避免“选边站”的方式。尤其是对于日本和韩国等中等国家来说，小多边制度使其得以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同时，还有能力基于利益导向参加非美国主导的制度性合作。这种“点菜式多边主义”成为双边与多边之外，聚集起相关国家并促进合作的一种形式。



从这一角度来说，小多边主义可以填补多边治理体系的空白，帮助弥补“多边主义治理差距”。

但值得注意的是，小多边主义并非实现全球治理的灵丹妙药。小多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一样有其特定的地缘政治背景，同时也与多边主义有着紧密联系。小多边主义并不能孤立地存在，其依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基础，作者认为，多边制度的彻底崩溃反而会使这些自愿、临时的机制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合作。因此，小多边主义应该被视为多边主义中一个较小的平行分支，而非与其相互矛盾。此外，对于小多边主义，也不乏对其包容性和多样性欠缺的担忧。小多边制度是否更具效率也缺少具体证据。

由此，文章主张建立一种“混合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使小多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之间的互补性增强。其关键是，最小化多边主义必须在多边价值观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因此最好是与多边主义并行而不是对立。具体路径包括：

1) 加强在非传统安全等特定领域内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减少因意识形态或其他原因影响而导致排除竞争对手或其他国家的情况。同时，随着这种非正式的合作关系在“+”模式下的扩大，小多边主义也将更具有多边性。

2) 促进小多边和多边运作模式之间产生更大的协同作用，为加强区域和全球秩序创造条件。

3) 利用小多边主义灵活和非约束性的特征，在非正式扩员的情况下，通过加强接触与联系来扩大范围和影响。这些措施帮助建立的混合系统可能有助于逐步重塑全球治理，至少，可以帮助缓解多边主义的持续危机。

编译：张尊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No. 2



Xian Wu and Dongchan Kim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8, No. 6, 2024.

“China’s Perception of Minilateralism and Chinese-style Multilateralism”**《中国对小多边主义的认知与中国式多边主义》**

经过多年探索，中国已形成其独特的多边主义概念框架，既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传统多边路径，亦涵盖关注朝鲜半岛问题的四方会谈机制等小多边形式。本文聚焦中国多边架构的根本性特质及其与美国小多边主义的差异，试图探讨中国式多边主义在外交战略中的未来走向。

文章指出，防御性、包容性和“规模优先”的倾向是中国式多边主义的核心特征。首先，中国多边机制的建立基于“中国难以建立针对美国的排他性联盟”这一现实，因此更倾向于建立防御性联盟，以对冲美国的小多边主义。其次，中国在融入自由国际贸易秩序的过程中始终坚守包容承诺，如邀请美国加入其发起的亚投行等多边框架等举措都是中国式多边主义具有包容性的证明。最后，“规模优先”而非效率优先是中国式多边主义的一大决定性特点，并和防御性与包容性紧密关联。具体体现在，中国倾向于扩大多边机制的成员规模，若构建针对美国的排他性联盟或设置严苛成员标准，将必然限制潜在参与国范围。因此，对中国而言，建立以扩大规模为首要目标的具有防御性和包容性的多边机制，成为增强制度韧性、对冲美国“脱钩”风险，并维系其在亚太和全球关键参与者地位的核心策略。



中国对小多边主义的看法则主要见诸于对美国小多边实践的分析。美国小多边主义存在双重逻辑：其一是植根于亚太地区多边主义竞争加剧的宏观背景；其二是旨在通过外交、经济与安全领域的联盟构建遏制中国。美国小多边主义兼具制度与战略双重意图，既在关键领域主导规则制定，同时系统性打造遏华联盟以限制中国崛起。中国对多边主义的概念偏好演变源于 1980 年代以来的外交实践及国际格局变迁，尤其受美国单边主义倾向与中美博弈激化的影响。中国式多边主义与美国小多边主义存在部分共性，如非正式性、成员有限性及议题导向性。然而，中国式多边主义又在防御性、包容性及对规模的优先考量等方面显著区别于美国小多边主义。中国式多边主义被视为多边追求的延伸，其逻辑与特征一脉相承；而美国的小多边策略则背离多边主义的包容精神，转向排他性、针对性的路径，战略目标直指削弱中国区域影响力。

未来，中国将在坚持传统双边路径的同时，更加强调中国式多边主义的发展，这主要基于双重动因：其一，作为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战略工具；其二，作为对冲美国单边主义与小多边主义的策略工具。在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外交轨迹将始终与美国政策动向深度交织，如果美国延续拜登时期的小多边策略，中国将继续采取防御性、包容性的制度对冲模式；如果特朗普重新掌权，中国式多边主义则将更多发挥遏制美国单边倾向的作用，或将赢得美国传统盟友与伙伴的支持。

编译：和怡然（北京外国语大学）



No. 3



Megan Dee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45, No. 3, 2024.

“Minilateralism and 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 in the Global Nuclear Order”**《全球核秩序中的小多边主义和有效多边主义》**

当前，全球核治理存在两大危机。一方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简称 NPT）框架因大国博弈、决策僵局导致核裁军停滞；另一方面，由于核国家与非核国家权力失衡，传统多边机构因代表性不足引发合法性危机，部分国家转向小多边机制应对核扩散、新兴技术风险等技术性挑战。在全球核秩序面临多边机制效能危机的背景下，本文关注国家如何通过小多边主义应对核治理挑战。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为：国家在何种条件下会选择小多边路径？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也对下述两个问题进行了说明：小多边主义如何补充或挑战以 NPT 为核心的多边机制？小多边主义的动态演变对全球核治理格局有何影响？

本研究选取了 1970-2020 年核治理中的典型小多边集团，如维也纳十国集团（VG10）、核供应国集团（NSG），并分析其目标、成员构成及与 NPT 的互动；本文构建了“内部小多边主义（Inside Minilateralism）”与“外部小多边主义（Outside Minilateralism）”的类型学框架。本研究指出，“内部小多边主义”依托多边机构（如 NPT 框架内协商），“外部小多边主义”如技术性出口管制机制，则独立运作。研究认为，小多边主义是一种关系性概念，依托于国家参与国际核治理的动态实践，其形式随国家对多边机构有效性认知的变化而调整。



研究发现，国家对小多边主义的路径选择取决于该国对多边机构有效性与合法性的认知。内部小多边主义，如维也纳十国集团、新议程联盟（NAC），通过跨区域代表性与 NPT 的深度整合，推动核裁军议程，增强多边机制效能；外部小多边主义，如核供应国集团、导弹技术控制制度（MTCR），由核国家主导，可以高效应对技术性防扩散问题，但因透明度不足和代表性缺失面临合法性争议。此外，小多边主义存在“内部—外部”的动态演变：对 NPT 失望的国家可能转向外部机制，例如通过人道主义倡议促成《禁止核武器条约》；而部分外部集团尝试通过技术合作融入多边框架，例如桑戈委员会（又称核出口国委员会，Zangger Committee）向 NPT 提交报告。研究强调，小多边主义对有效多边主义的补充程度取决于其合法性、透明度及与多边机构的整合能力。

本研究提出三点政策建议。首先，增强外部小多边集团的透明度，建立专门网站等信息公开机制并允许观察员参与，缓解“民主赤字”。其次，内部小多边主义需吸纳更多发展中国家，外部小多边主义应调整准入标准，减少大国垄断。最后，世界各国需要深化机制衔接，推动小多边倡议与多边机构的制度化合作，如将核供应国集团的出口管制清单纳入 NPT 审议程序，提升协同效应。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突破“小多边主义 vs 多边主义”的二元对立，提出动态类型学框架，揭示两者的互补特性。从实践层面上，本文有助于为全球核治理改革提供参考。然而，研究存在一定局限。第一，本研究采用的案例主要聚焦防扩散领域，对人工智能与核军控等新兴议题涉及较少。第二，本文对小多边主义合法性的衡量标准未充分讨论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

编译：刘哲希（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No. 4



Nick Bisle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Forthcoming

“The Quad, AUKUS and Australian Security Minilateralism: China’s Rise and New Approaches to Security Cooperation”**《四方安全对话、奥库斯与澳大利亚的安全小多边主义：中国崛起与安全合作新路径》**

本文探讨了澳大利亚近年来在亚太地区安全环境中对中国崛起的回应，尤其是其对“小多边”机制的依赖，如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奥库斯（AUKUS）。文章分析了澳大利亚为何转向这些小多边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在当前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和经济相互依存的背景下，对安全合作的启示。研究指出，澳大利亚的安全政策并非简单的“硬制衡”或“制度制衡”，而是通过“安全基础设施”的建设，试图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增强传统安全能力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自 2017 年以来，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从经济上受益于中国崛起的乐观态度，转变为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的焦虑情绪。这种转变促使澳大利亚在安全政策上采取了新的“小多边”合作方式，即重新激活 Quad 和建立 AUKUS。文章的核心问题在于：澳大利亚为何转向小多边机制？这是否代表了传统安全合作模式的转变？在当前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相互依存的背景下，这对区域安全合作有何启示？

文章首先回顾了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转变背景。自 2009 年澳大利亚首次在国内防白皮书中提及中国崛起带来的战略挑战以来，其对华态度逐渐从经济利益与



安全关系的分离转向对中国战略意图的怀疑。2017 年，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公开表达对中国在地区事务中影响力的担忧，并在 2018 年通过立法限制中国企业在 5G 网络建设中的参与。2020 年，澳大利亚进一步调整其国防战略，将中国视为主要的战略威胁。

文章接着分析了 Quad 和 AUKUS 的性质与功能。Quad 最初成立于 2007 年，旨在协调美、日、印、澳四国的安全政策，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2017 年，Quad 重新启动，其合作范围从传统的军事安全领域转向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建设、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等领域。AUKUS 则是一个更具战略性的安全合作机制，旨在通过技术共享和核潜艇合作增强澳大利亚的军事能力。这一机制不仅关注传统安全领域，还涉及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网络安全等新兴技术。

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澳大利亚转向小多边机制的原因。一方面，澳大利亚的政策转变受到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即系统层面的变化（如中国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与国内层面的威胁感知共同作用，这促使澳大利亚调整其安全战略。另一方面，澳大利亚试图通过小多边机制增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同时避免与中国直接对抗。文章指出，Quad 和 AUKUS 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硬制衡”或“制度制衡”，而是通过“安全基础设施”的建设，试图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增强传统安全能力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文章最后得出结论，澳大利亚的安全政策转向反映了其对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和经济相互依存的复杂回应。通过参与 Quad 和 AUKUS，澳大利亚试图在不损害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增强其应对中国崛起的能力。这种“小多边主义”并非简单的军事同盟或经济合作，而是一种新型的安全合作模式，旨在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增强“安全基础设施”来实现战略目标。文章的贡献在于揭示了



在当前国际环境下，中等强国如何通过创新性的安全合作机制来应对其所认为的地缘政治挑战，同时也为理解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未来趋势提供了新视角。

编译：郑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全球治理研究团队

任 琳 熊爱宗 韩 冰 吴国鼎
陈兆源 黄宇韬 李 冲 韩永辉
宋 锦 田 旭 沈 陈 彭 博

研究助理团队

兰馨彤 张尊月 苏山岳 孟思宇
杨嘉豪 邢珣璠

声明：对观点的摘录和引用不代表编者本人及其所属单位对观点的认同。

